

新中国 文物捐献 精品全集

中国文物学会 主编

徐悲鸿／廖静文

卷

上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天津出版社



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徐悲鸿/廖静文 卷 上

中国文物学会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文 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徐悲鸿、廖静文卷. 上 /
中国文物学会主编. — 北京 : 文津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80554-592-9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文物—中国—图集②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③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①K87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0443号

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徐悲鸿/廖静文 卷 上

XIN ZHONGGUO JUANXIAN WENWU JINGPIN QUANJI XU BEIHONG/LIAO JINGWEN JUAN SHANG
中国文物学会 主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文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9毫米×1194毫米 16开本 19.25印张 185千字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554-592-9

定价: 480.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谨此
向新中国无私捐献文物的爱国人士致敬

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主编单位 中国文物学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吕章申 李晓东 金冲及 单霁翔 耿宝昌 傅熹年
廖静文

编委会

主任 单霁翔

副主任 黄元 刘炜 曲仲

委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宜 王曷灵 杨新 陆晓如 陈飞 段国强

总主编 谢辰生 彭卿云

执行主编 刘炜

副主编 段国强

徐悲鸿/廖静文 卷

主编单位 中国文物学会 徐悲鸿纪念馆

顾问 廖静文

编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宜 王曷灵 杨新
陆晓如 陈飞 段国强

七律

文物珍藏今古傳 仁人志士是中堅
彈勞馳驟求瑰寶 荃萃琳瑯成鉅編
贏回楚弓存故土 賡承先澤啟新篇
喜刊精品饒丰彩 遺范呈輝勗后賢

題《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出版

甲午仲夏

謝辰生



時年九十二

七律

文物收藏千古傳 高人雅士志弥堅
追尋瑰器傾家產 集萃精華汇土編
悉數还珠成國粹 一腔忠赤著鴻篇
重光人物揚風范 精品流芳育众賢

喜讀謝老題《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

出版七律詩步原韻和之

甲午仲夏

彭仰雲





序

励小捷

捐献文物是爱国重文的优秀品质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物保护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社会贤达、各界收藏家纷纷捐献文物，补充考古发掘所得，丰富馆藏展示陈列，壮大了博物馆的藏品规模，优化了博物馆的藏品结构，使一大批散逸文物回归国家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新中国文物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事迹与精神永远值得表彰、纪念和传承，中国文物学会组织编纂《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就是对文物捐献群体的一次集中展示和致敬。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各界人士捐献了数以十万计的各类文物。故宫博物院累计接收捐献文物近两万件，其中一级文物三百余件，捐献者达六百余人次。中国国家博物馆自建馆伊始到2012年的一百年间，累计接受社会各界人士捐献古代文物六百三十余人次，涉及文物六万六千余件。国家级博物馆如此，地方博物馆亦如是。以青岛市博物馆为例，五十多年来，该馆先后接受了五百多位社会各界人士的文物捐献，馆藏逾万件珍贵文物中有五分之一来自个人捐献。大量的文物捐献不仅显示了社会各界对博物馆的信任和对其文物保护、展示和研究的嘉许，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部多次向文物捐献者颁发嘉奖令，极大地鼓舞了文物捐献行为，这一时期各级博物馆接受捐赠人次多、规模大、文物品质高。在文物捐献者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著名收藏家、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有爱国华侨、华人和国际友好人士，也有普通群众。郑振铎先生早年不惜倾尽家财，搜集了横贯汉魏、两宋一千四百多年的六百余件陶俑，使珍贵遗产不致流失海外。1952年，郑振铎先生毫不吝惜地将其全部捐献给国家。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其呕心沥血三十年所收藏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珍品悉数捐献给国家，他说：“东西在我的手里，就是在国家的手里，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国

家，无偿捐献。”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篆刻家商承祚先生多次将个人珍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他生前砥砺自己并告诫家人“藏宝于国，施惠于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箴言：“文物藏之子孙，莫若藏之国家。藏之子孙，难免散失；藏之国家，万无一失。”他们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弥足珍贵，他们的仁心义举与捐献的文物一样，必将青史留名、千古流芳，值得我们永远珍藏、景仰。今天，我们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文物是历史发展的物证，文物在个人手里，难免受到保存条件所限，而且“孤芳自赏”，难以发挥文物的社会功用。“藏宝于民”无疑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从长远来看，将流散文物汇集到博物馆，使之得到永久性保存，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无疑是民间收藏特别是“国之重器”的最好归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博物馆建设的提速，捐献文物得到了更好的展示陈列，有的博物馆开辟专门场所进行展出，有的博物馆举办捐献文物特展，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通过讲述文物捐献者的感人故事，为全社会树立了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榜样，可以缅怀前贤、激励后人，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文物收藏理念，增强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时间流逝，世事沧桑，不仅社会上的普通人，即使一些文博工作者对新中国成立后捐献文物的人和事也知

之甚少，从这个角度说，编纂出版《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不仅是一项泽被后世的重大文化工程，更是一项历史记忆的抢救工程，善莫大焉！

值此全集出版之际，谨向参与这项工作的诸位同好表达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敬意！希望此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物捐献者的事迹，认同文物捐献的义举，以期更多的文物收藏者加入到捐献行列，让更多的文物走进博物馆绽放光彩、述说传奇，那将是文博界的幸事，更是全社会的福音。

是为序。

励小捷，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序

单霁翔

文物之珍贵，在其自身质地的精细考究，在其制作者的匠心独运，也在其所蕴含的深厚寓意。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代代传承，即通常所谓“流传有绪”。数千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在青铜重器上刻下“子子孙孙永宝用”的期盼。这种世代传承、流传有绪的理念使得文物越发珍贵，历久弥新。

在博物馆这一概念尚未兴起之时，历代传世的珍宝多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流传，而紫禁城更是藏尽天下奇珍的巨大宝库。但不论是私人收藏还是皇家品鉴，都难以

抵抗战乱的侵袭。特别是近代以来，博物馆事业尚在缓慢萌芽，社会动荡却愈演愈烈。在国将不国的纷乱中，国宝蒙难，毁坏、损伤、流散者不计其数，令人痛心疾首。及至战火消弭、新中国成立，才给这些国宝带来了转机。此时的博物馆事业方兴未艾，传世珍宝应为国家、人民所共有，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样的认知，使得我国兴起了捐赠文物的热潮。许多流散珍宝自此走进了博物馆，开始了由“私藏”到“馆藏”的转变。

就故宫博物院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接收捐献文物两万余件（其中一级品三百余件），捐献者共计六百余人次。在这些捐赠者中，既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也有著名的学者、收藏家，还有海外华侨、国际友人，甚至是普通职工、平民百姓。捐赠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法书、绘画、陶瓷、乐器、织绣、铜器、碑帖等不一而足。而在这些珍贵文物的背后，大都隐藏着一段段或是曲折离奇或是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于捐赠一事上为全国做出了表率。他将友人赠送的著名书法作品王夫之手书《双鹤瑞舞赋》、钱东壁临《兰亭十三跋》、李白《上阳台帖》等捐给国家，并最终由文物局拨交给故宫博物院。在他的带领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陈毅、宋庆龄等，也纷纷通过中央办公厅将文物捐赠给国家。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收藏有六百余件陶俑作品。这批陶俑横贯汉、魏至两宋

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品种丰富，十分珍贵。为了收集这些陶俑，使其不致流失海外，他不惜倾尽家财，甚至债台高筑，但却在1952年将其毫不吝惜地全部捐献。

张伯驹是一位收藏大家。他以重金购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即使在战火逃亡中也不忘尽力保全；为购买展子虔的《游春图》，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面对绑架勒索时，“宁死魔窟”也绝不变卖家产。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毫不犹豫地将其捐献给国家。被誉为“宣德大王”的孙瀛洲，在新中国成立前经营古玩铺，收集了许多珍玩，其数量之多、品质之精，足可以开办个人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毕生所藏的三千多件文物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仅陶瓷一项就有两千余件，更有如明代成化斗彩三秋杯等稀世珍品。

许多老一辈故宫人也将毕生收藏捐赠于故宫，如吴瀛、马衡、陈万里，他们不仅为故宫博物院的发展耗尽心血，更将自己毕生所藏留在了他们奋斗半生的地方，延续着他们对文物深沉的爱。至于那些海外华侨或是普通百姓，如定居美国却一心要将家珍送回祖国的杨令蓓女士；多方追查、重金购买掐丝珐琅冰箱（原为宫廷用品）并无偿捐赠的天津市民陆仪女士；为保拓片完好留存，不致失传散逸而将明刻明拓《兰亭序图》卷捐献故宫的归质忱、袁静和夫妇……他们的名字虽不能一一列举，也可能不会被人们牢记，但这份赤诚之心永远不会褪色。

这样的捐赠义举，不独出现在故宫博物院，在全国的诸多博物馆里都有着相似的动人事迹。与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的大克鼎、大盂鼎早年由潘祖荫一家收藏。潘家数辈人爱宝如命，竭力维护，令二鼎躲过一次次的觊觎与抢夺。直到新中国成立，为了宝鼎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潘家人将此二鼎捐献给国家，以求鸿宝重器能够长久保全。如今大克鼎陈列于上海博物馆，大盂鼎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一南一北镇守着中华。

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收藏有不少家珍。抗日战争期间为防日寇破坏抢夺文物，他冒着战火抢救古墓、收购古物。新中国成立后，商老将家中珍藏的千余件国宝捐赠给国家，惠及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以及湖南、江苏等全国多家省、市博物馆。商老认为文物藏之子孙难免散逸，藏之国家则万无一失。因此，他主张“藏宝于国，施惠于国，施惠于民”。1990年（商老去世前一年），他将郑燮的《四面风竹图》捐赠给了深圳博物馆。这样始终坚守“藏宝于国”的精神，令人钦佩。

历经半个多世纪，在众多捐赠者前赴后继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文物离开私家走进了博物馆，为世人所共鉴。这无疑给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国宝历尽漂泊终归故土，更是文化的承继与发扬。作为文物工作者，我们真心地感谢这些无私的捐赠者。他们不迷于名利，不屈于淫威，甚至不惜一切地将文物捐

献的义举，厥功甚伟，百世不磨！

饮水思源。各地博物馆都在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捐赠者的感谢及对这种崇高精神的弘扬，如开办以捐赠者或捐献文物为主题的展览，出版纪念图书图录等，使得人们可以领略文物的风采与捐赠者的仁心，并扩大其社会影响力，以感染更多的人。

故宫博物院于2005年开辟景仁宫为捐献馆。景者，日光也。景仁者，光大其仁人之心也。景仁宫中立景仁榜，其上镌刻了所有曾向故宫捐赠珍宝的海内外人士。他们的名字值得为人称颂，值得永远铭记。相关的专题展览包括：二十三家捐献印章展（2006年）、章乃器先生捐献文物展（2007年）、萧友龙先生捐献文物精品展（2010年）等。此外，故宫博物院正在出版“捐献大家”系列图录，目前已出版了张伯驹、叶义、郑振铎、孙瀛洲、吴瀛、马衡等人的专集。

展览和出版，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些平凡的捐赠者与他们背后不平凡的故事，彰显其仁义之举、拳拳之心。而作为捐献文物的接收单位，为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故宫博物院也一直与捐赠者或其家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每年都为他们寄送《故宫日历》与《紫禁城》杂志，以示答谢。每逢重要年份，故宫博物院还会组织专题座谈会以缅怀、纪念那些故去的先人。如2007年举办了纪念陈万里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座谈会，2008年举办了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

会，等等。

应该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看重古董珍玩的巨大经济价值，加之法律法规在捐赠行为上的模糊，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文物捐赠。但也得益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国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黄金有价而文物无价，千金易得但国宝难求，祖国的博物馆才是这些文物国宝最好的归宿。

张伯驹先生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有这样的捐赠者，是文化之幸，中华之幸。前有为文物天涯追索、以命相护的捐赠先贤；后有寻国宝不惜重金、不为名利的当代楷模。我们有理由相信，世俗的风气压不倒文化的传承，今后捐赠者的队伍会不断壮大，将有更多的文物国宝走进我们的博物馆，绽放它们的光彩，述说它们的传奇。

单霁翔，文化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